

NIETZSCHE IN CHINA

成芳 著

尼采在

Nietzsche in China
尼采在中国

成 芳 著

南京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 009 号

尼采在中国

成 芳 著

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江 苏 省 新 沂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.5 字数 38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2000 册

ISBN 7—80560—831—8

B·21 定价:8.80 元

南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Friedrich Nietzsche

像 采 尼

序

牛子孺

这本《尼采在中国》，作者署名成芳，其实，他又叫杜诗言，是我相识多年的一位忘年交。

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经常到我这里来借书或谈一些问题，所以我知道他写这本书是非常认真，又非常艰苦的。现在，总算写出了近三十万字，真让我感动。书成以后，他嘱我为之作个序。说实在的，我真不愿意干这件事。年轻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出来了，干嘛非要半个老人在上面贴个标签呢？我看到方格子里一个一个爬出来的蝇头小字，要我通看一遍都很困难，现在要我把名字冠在这些文字前面，我真于心不忍，但再三推辞不下，只好写几个字了。

这本书稿我还没通看一遍，但听了作者介绍，知其基本精神、基本结构是好的，有不少独到之处，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，这不要紧。这方面的专著据我所知国内绝无仅有，但又是一个极好的选题，如果等到一点争议也没有了，恐怕这本书也付之东流了。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翔实，信息量大，读者即使不同意作者的全部意见，但这份材料是极其宝贵的。所以我相信其学术价值是会比较久远的，它不是那种在尼采热中赶时髦的东西。

我虽然和本书作者一样，并不赞成尼采的全部，但有一点，象尼采那样做人、做学问是我们聊以共勉的。有些人不具有这样

的人格，却对尼采妄加非议，我只能说他们还不配谈尼采。

对尼采这样的人，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他，极左、极右都是万万要不得的。本书作者还年轻，我经常劝他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，看来，他在这方面也是下功夫的，碰到具体问题，已能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作具体分析，我认为这是做任何学问的基本保证。

这本书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，但和一般历史书不同，它不是以一种刻板的面孔出现，让人相信历史原本就是这样的，而是溶入一种很强的个性，让人感到作者所认识的历史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不满意于作者，只好自己去重新探索，这时，本书会给你提供极有价值的线索。

这本书的作者在此之前并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尼采的文章，但我知道，他是一个“尼采迷”。记得有一次他写了一首七律诗，题为《尼采像赞》（好象是有意模仿当年王国维写《叔本华像赞》），拿来让我“斧正”，我读了之后，觉得写得很不错，只在个别字上作了音韵方面的调整，但我坦白地告诉他，我无法替他向有关刊物推荐，我想推荐了人家也不会发表。对此他表示无所谓。现在，我征得作者同意，把他的这首诗抄在我的这篇序里，诗是这样的：

心比耶稣苦痛深，
不杀上帝堪作人？
偏说撒旦非恶煞，
只认缪斯是真神。
且把天国移此岸，
莫因圣典桎其身。
超人桥落渊海上，

谁见方舟渡众生？

我本人也绝少发表有关尼采的文章，因此，在这段历史中没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我也不想以这篇序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。我只希望这部书能早日问世，我当能与作者分享欢乐。

1992 年元旦于南京

前言

在李永炽所译[日]工藤绥夫所著《尼采的思想》([台]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6 年 5 月)一书中,我见到一幅地图,叫作“尼采漂泊的世界”。德国哲学家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当了十年的古典语言学教授,终于因病辞去教职,走出书斋,进入孤独的漂泊。

尼采漂泊的世界实在是很狭小的,比起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少年壮游要逊色得多。然而,正如周国平所介绍的那样:

尼采辗转在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士、德国的一些城镇之间,为他多病的身体寻找合适的气候,在一地逗留不超过数月。他常在一个名叫西尔斯-玛丽亚的山村度夏,在尼斯过冬。一开始是疾病驱使他易地而居,但是,一旦走出书斋,置身于大自然中,他发现这种萍踪无定的生活原是最适合于他的本性的。(见王树人主编《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》中尼采一章,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)

在这种萍踪无定的生活中,尼采直接从大自然取得灵感,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诗化哲学。虽然世界之大,远非他的足迹所能遍至,然而,他的思想,终于象长上了翅膀,飞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。

尼采虽然知道东方有一个文明古国叫中国,可是,他从来没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大地。我的这本书取名《尼采在中国》,不是一本尼采东游漫记,而是一本评述尼采近一个世纪来影续中国的历史。尼采的名字自从梁启超 1902 年第一次介绍给国人,迄今整整九十年了。这九十年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,从现代走向当代的轰轰烈烈的九十年。在这九十年中,发生了三个大事件,1919 年的五四运动,1937 年开始的八年抗日战争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今日的改革开放。而伴随着这三个大事件,都兴起了一股“尼采热”,单凭这一点,“尼采在中国”这一课题就颇值得研究。

不仅如此,被毛泽东称为代表了“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”的鲁迅,竟然被人尊为“中国的尼采”,这又是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和抹杀的事实,更增加了“尼采在中国”这一课题的诱惑力。

然而,时至今日,“尼采在中国”的研究尚未在中国结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来,或者说,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展起来。难道我们真的象朱光潜所说的,只有创造历史的酒神冲动,而无审视历史的日神冲动吗?我所掌握的材料中,有下面三篇可以说代表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尝试:

乐黛云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0 年第 3 期;

程伟礼《尼采哲学在近代中国》,《青年论坛》1985 年第 5 期;

谢伟民《尼采、法西斯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》,《读书》1986 年第 10 期;

然而,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来看,离“尼采在中国”这一课题的要求还差得太远。乐黛云的文章主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,把尼采与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陈铨等人作了比较研究,开了一个先

河,但只是抓住了几个小侧面,而且他的有些结论已经受到人们的挑战(比如程代熙的《朱光潜与尼采——读〈悲剧心理学〉》,《读书》1983年第1期)。程伟礼的文章又绝没有超越乐黛云的地方,而且给一篇很短的文章加了一个太大的题目。谢伟民的文章则在省略了基本历史事实的情况下,便试图对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出逻辑概括,虽然结论可能不错,但终觉论据不足。

记得有一次,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读到张钊贻所著《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》(香港青文书屋1987年5月)一书,在作者所开列的资料清单中,得知西德汉堡东亚自然与人类文化化学学会情报部1975年出版了Marian Galik所著《尼采在中国(1918~1925)》一书,又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1983年3月出版的《远东历史论文》第27期上载有D. A. Kelly所撰《尼采在中国:影响与亲和力》一文。当时我就想,中国人的历史难道也要靠外国人来研究吗?单凭这一点狭隘的爱国的冲动,我便立志要写出自己的一部《尼采在中国》。

有了这样的决心,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留心搜集一些资料,做些索隐钩沉的工作。张钊贻的书中有有一个书目提要,对我一开始的工作帮助很大。可是,许多书目前作者都打了*号,意即只知篇名,未见原文。其余的篇名也只有提纲挈领的几行字,夹杂着颇带作者主观色彩的按语。也许是出于一种学术的“强力意志”吧,我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,亲自占有尽可能全的第一手资料(因为我所作的是尼采研究之研究,因而中国人研究尼采的文字,都是我的第一手材料,而尼采的原著可以说是元材料了,原著译本则是准元材料),否则绝不动手写书。

对“尼采在中国”这个题目接触得越多,就越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。随着案头资料堆的不断增高,信心也一天天在下降。有时真想拉倒算了,可是,一想到自己为搜集这些资料所花费的时

间、心血和钞票，便又欲罢不能。况且，我想到，有多少相识、不相识的朋友千里之外把我索要的资料印好，寄来，一封封信中所表达的对我的愿望，如果我就此半途而废了，又对得起谁呢？

我有很长时间，生活在这些资料堆中，我多么希望尽快消化完这些资料，将它们浓缩成自己的《尼采在中国》一书，这样，我就会象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，享受一次把攒起来的零钱兑换成一张大票子的喜悦。

但我又实在不能为了急于了此心愿，而一日千里。张钊贻书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每每为了一条注释，一段补充，买书数百元，读书十多本，写信若干封，失眠三四日。真羡慕有位专家竟能日写五六千言，如写小说。没办法，惟叹自己资质愚钝而已。

对此，我是深有同情的。在消化资料的过程中，有时忽然发现少了一篇文章，于是乎，南京各大图书馆便被我踏遍了。找到了，一阵欣喜，找不到，一封封信就飞向了外地各大图书馆，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，让人心焦。有时，家里人劝我，缺它一两篇资料就算了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有的人从来就没有这么认真过，不照样写出一篇篇论文来吗？可我不能不认真。我知道这样对成书时间要耽搁些，但我希望书成以后，流传的年代要久远些。

这里，我又想起了已故陈铨先生在《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》（《战国策》1940年第6期）一文中说的一段话：

一个德国学者，发表一本研究工作的书，常常搜集极丰富的材料，普通的人读起来，都觉得芜杂仔细，不

能终卷，然而提到这一个问题，他的书却是一本最重要的书。

尼采也是一个德国人（尽管他本人常耻于这一点，宁称自己是波兰后裔或欧洲人），当我们面对着他这个对手的时候，如果没有陈铨所说的“这一种不怕麻烦，不惮详细，不感疲倦，极力追求事体的究竟，达到精神准确的知识”的治学态度，是注定要败下阵来的。

找资料要花时间，可以忙里偷闲；要花精力，可以豁出命去；可要花钞票，这可让我为难了。自己的研究课题是自己定下的，没有任何人的资助，一心搞研究了，又不可能去搞点什么外快予以贴补。怎么办呢？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个以书养书的办法。于是暂停了手头的工作，去编了一本《畸形的智慧——新编愚蠢故事精选》（南京出版社 1991 年 7 月，署名杜诗言）。

说老实话，我应该承认，我之所以想到搞这么个选题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尼采的启发。尼采在《偶像的黄昏·四种大谬误》中指出了人类容易犯的四种大谬误为：混淆因果的谬误，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，幻想原因的谬误，自由意志的谬误。其实，这些都是人类所犯的愚蠢的错误，我书中的几个故事就是自己根据这几种错误类型编出来的。其中《戒药益寿》一则完全是从尼采所讲的一个故事中化来的。尼采说：

再也没有比例果为因更危险的谬误了，我称之为理性的真正堕落。……我举个例子：人人知道著名的柯纳罗的书，他在这本书里把他的节食推荐为活得长寿、幸福（以及有德）的良方。很少书能够如此多地被人阅读，直到现在，在英国每年还要印好几千册。我毫不怀

疑，几乎没有一本书（当然《圣经》除外）象这个如此好心肠的怪东西这样，造成这么多的祸害，缩短这么多的生命。其源盖出于：把结果混同为原因了。这个厚道的意大利人把他的节食看作他长寿的原因；其实，长寿的前提，即新陈代谢的极其缓慢，微乎其微的消耗，才是他节食的原因。对于他来说，吃多还是吃少并非任意的，他的节俭并非一种“自由意志”，他吃多就会生病。但是，倘若不是这种鲤鱼之躯，一个人就不仅最好、而且必须适量进食。我们时代的学者，神经力之消耗如此迅速，使用柯纳罗养生法只会致自己死命。（周国平译《偶像的黄昏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）

我据此改编的故事是这样的：

有个老寿星，活到一百多岁了，身体依然很健康，行动自如，耳聪目明，人们都非常羡慕他。

有一个体弱多病，已经半截身子下土的人想获得延年益寿的秘诀，便慕名前来向这个老寿星讨教。老寿星对他说：“我没有什么秘诀，无可奉告，但有些经验之谈，我这一辈子，从来没尝过药是什么滋味，三灾六病好象与我无缘。”

这人听了老寿星的话，心想：对啊，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日见衰弱呢？不就是因为吃药吃得太多了吗？回到家里，他便把所有的药罐子都砸了，决心从此不再吃药。有时病得严重了，妻子劝他去看医生抓点药来，他坚决不去。妻子省吃俭用买了些补品给他养身子，他却不知好歹地说：“难道你想催我早死吗？”

由于长期有病不吃药，这人终于死去了，死的时候尚未到知命之年。

这则愚蠢故事告诉我们，倒果为因是一种致命性的错误。我们难道不经常犯这种错误吗？比如说，尼采正是敏锐地洞察到“上帝死了”以后的“虚无”，才对之进行哲学上的概括，而形成他的哲学中的“虚无主义”内容的，同时，他为了反抗这种虚无，在他的哲学中又加进了反虚无主义的内容。所以，应该说，虚无是因，尼采哲学是果，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尼采哲学的价值与意义。如果反过来，认为尼采哲学是因，虚无是果，那岂不是冤煞尼采吗？加缪对此曾经说过：

由于有了尼采，虚无主义似乎变得有预见性了。但是，在尼采的作品中，如果不首先看到他的临床医生的作用，而是相反，重视他的先知者的作用，那么，除了那些他自己也恨之入骨的低级的、平淡无奇的杀人放火之类的东西外，他的作品也就再无可取之处了。……在他身上，虚无主义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东西。外科大夫和预言家都根据未来思考和行动，这点上，他们有共同之处。尼采从来只按照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去思考，他不美化世界末日，因为他想象得出世界末日会是一番什么样卑劣的、费尽心机的景象，他正是要避免它的到来，并把它改变成为再生。他承认虚无主义，并把它作为一个临床症状去研究。他自称是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，但这并不是出自对虚无主义的偏爱，而是现状决定的。因为他太伟大了，他不能拒绝时代给他的遗产。（《尼采和虚无主义》，郭强译，《文艺理论译丛》第

3 辑,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)

加缪在分析因果关系时的逻辑,看来是不混乱的,他不如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荒谬。

尼采好像是说过人类的错误比人类的真理更有价值,我们不妨这样理解,人类的错误使人类更好地接近真理。同样,人类的愚蠢比人类的智慧更有价值,因为人类是以愚蠢的方式接近智慧的。所以,当人们都热衷于编各种各样智慧故事集的时候,我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,编它一本愚蠢故事集,由于该书选题好,一次发行上万册,据说香港三联书店还订了好几十本呢。自己连深圳都没去过,书倒先到了香港,即使不为一点稿费,也够让人快慰的了。

这本书的稿费,还不够我至今花在搜集资料上的费用,正如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的稿费还不够他的烟钱一样。说来不怕读者寒伧,有一次到上海去找资料,不敢住旅店,不敢下馆子,白天啃面包,晚上就在火车站前的水泥地上躺着。那一夜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不孤独,因为在我旁边还躺着许多南来北往的客,有人的鼾声竟把我闹醒了一两次。那是一个多么美的夜啊!

最近读到《德国哲学》第 10 辑(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6 月)上的一篇《“尼采在中国的影响”专题研究参考书目》。得知该参考书目作者[瑞士]冯铁也在进行和我一样的“尼采在中国的影响”这一课题的研究。冯铁掌握的材料,大部分是港台方面的,是我没有掌握的,也许这种情况是他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不具有使然。但是,我敢说,大陆方面的材料,他绝对只掌握了我的一个小子集。而且有这样两点,我感到自豪:

• 他的有些资料想必只知篇名,并无原文,有些甚至从别人那里转抄错了,而开列在本书资料清单里的资料基本是我亲自

占有的，至少是亲自读过的；

• 他时至今日还只列出一个参考书目，而我的《尼采在中国》一书已经写出来堆在案头，下一步就是寻找出版者了。

但是，我对远在异国瑞士的冯铁还是有一种未见其面，已成知己之感，因为我们绝对是相互独立（或平行地）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了，我在希望自己的书早日得以出版的同时，也希望早日见到冯铁的研究成果问世。

在冯铁的参考书目中，我得知贺麟曾写过一篇《尼采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》，载 von der kolonial politik zur Kooperation，郭恒钰编，慕尼黑，1986 年。贺麟是哲学界的老前辈了，使我钦佩的是，他在抗日战争中期，尼采法西斯化已成世界潮流的时候，便敢于站出来为尼采翻案，历史说明他是正确的。关于贺麟，在我的书中有不少地方提到。但我感到不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在这里也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呢？我只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在自己的祖国开放，国人拿去作借鉴也好，作参考也好，进行批判也好，我都会感到满足的。

为了这本书，我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，真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。望着通明的灯火，我想起尼采的一首诗《看哪，这人》（周国平译《尼采诗集》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 12 月）：

是的！我知道我的渊源！

饥饿如同火焰

炽燃而耗尽了你自己。

我抓住的一切都化作光辉，

我放弃的一切都变成煤：

我必是火焰无疑！

尼采说过，每当夜晚疲倦时，看一看墙上挂着的叔本华像，便立刻来了精神。现在，夜又深了，睡魔向我袭来，可一见到压在玻璃台板下的尼采像，便又坚持写下了这篇文章，权作《尼采在中国》的前言吧。